

一、2001年4月日本通过右翼教科书

1. 毛遂自荐的“编撰会”

日本从1998年起开始编写2002年4月使用的新教科书。原来承担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写的共有7个出版社，它们分别是东京书籍、日本文教、日本书籍、教育出版、大阪书籍、帝国书院和清水书院。但到2000年4月，当文部省开始审查新教科书版样时，富士产经集团的子公司扶桑出版社也提交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教科书样本，并得到文部省的接受。这样历史教科书的出版单位增加到了8个。接着“编撰会”在电视上向全国展示了他们编撰的清样，鼓吹其内容和特色，同时开始向地方议会和学校推荐其教科书。

这个“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以下简称为编撰会）是日本右翼学者组成的团体。右翼学者自称持“自由主义史观”，他们奉行的是新国家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他们认为日本现行中学历史教科书存在着“偏见、自虐、反日”的倾向，是“民族自虐”的课本，因此组成“编撰会”的目的是精心炮制一种歌颂大和民族、掩盖国家历史污点的历史教科书。他们不懈努力的结果是，《中学历史教科书》及《中学社会教科书》终于编成。他们自诩这套教科书有5大特色：例如“体现献身、公共心、勇气、勤勉的（日本人）美德”，让学生们理解“战争时期日本所处的立场，并对先人们的不断努力怀有敬意”，重视传统的语言，极力避免“支配”、“抵抗”等特定看法。

的语言 战争称谓尊重当时使用的‘大东亚战争’等。^①但这套“颇具特色”的教科书送交日本文部省审查后 即被指出有问题的地方多达 400 多处。随后“编撰会”不得不进行一些修改 但也没改变其掩盖若干历史事实的本质。平心而论“编撰会”的骨干大多非历史学专家 仅有的几个历史学教授 也不是写作教科书的里手。匆忙拼凑的班子 对历史、对教育多是外行 连纸张开本也用得不一般“编撰会”用的是 A5 纸 比常规的 B5 纸张要小得多 形式上就缺少了感染力。他们所拥有的只是右翼的思想。

“编撰会”所编教科书不仅否认侵略战争的性质 还大肆鼓吹“侵略有功”。他们宣称 日本当年发动战争的目的“是自存自卫和将亚洲从欧美统治下解放出来”。而侵占中国东北 扶持伪“满洲国”傀儡政权 进行残酷压榨和掠夺 在教科书中却成了“以五族协和、建设王道乐土为口号，通过日本重工业投资等获得经济增长，中国人的流入也显著增加”，从而赤裸裸地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对于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惨案，书中竟轻描淡写地以“南京事件”一笔带过 并暗示南京大屠杀惨案“尚无定论”力图否认侵华日军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创伤、在全世界遭受同声谴责的这桩野蛮暴行。总之 承担教育后代重任的教科书 应包含一个民族对其历史和社会的历史认同、人权意识、男女平等意识等 但是“编撰会”的历史、社会教科书 却是否认侵略战争的性质 隐瞒殖民地统治的事实 宣扬日本民族优越史观、皇国史观、男性中心史观 具有拥护家族制度的浓重色彩。所以“编撰会”的教科书是彻底的右翼教科书。

转引自王希亮：《评日本当代历史修正主义》，《抗日战争研究》2001 年第 2 期。

2. 文科省对‘新历史教科书’的支持

2000年12月文部省对教科书进行第一次审定，对所有出版社的送审本提出了正式修改意见。8家出版社历史教科书样稿的修改数量分别为：东京书籍 18处，日本文教 41处，日本书籍 35处，大阪书籍 13处，帝国书院 29处，清水书院 22处，扶桑社 137处。可见文部省的专家对扶桑社“编撰会”的样本最不满意，意见最多，比审定意见最少的大阪书籍出版社多 10倍以上。而且，在 137处修改意见中，有 31处是一整页或接近一整页需要修改的。根据文部省原有的规定，2002年使用教科书的审定，每个样本有两次修改机会。但此次文部省把“编撰会”作为追补对象给予了 3次修改机会。“编撰会”提供的另一本教科书《中学社会教科书》书稿需要修改的地方也多达 99处。由于需要大量的修改，因此日本这次公布教科书审定通过的日期比原定的 2月 28日推迟了一个多月。显然，这是文部省为使“编撰会”教科书审定合格而进行的“特殊处理”。

2001年1月初，原文部省与科技厅合并，成立了文部科学省（简称文科省）。文科省宣布，日本教科书鉴定调查审议会将在 2001年3月中下旬分别提出对 8种历史教材的鉴定结果，然后由文科大臣町村信孝作出最后决定。日本政府有关人士说，政府将对历史教科书采取“不进行政治干预的方针”。实际上，“不进行政治干预”也是一种政治，也是一种对策。很明显，日本政府是支持新历史教科书美化侵略战争的“修改”的。

然而，“编撰会”对文科省针对《中学历史教科书》书稿所提的 137条修改意见，仍采取敷衍态度，只对其中 90处作了一些文字修改，书稿中歪曲史实、美化侵略战争的实质内容没有从根本上进

行修改。“编撰会”何以如此大胆，原来他们已与文科省多少有了默契。文部科学大臣町村信孝已为“编撰会”教科书的审定合格开放了绿灯。早在 2000 年 12 月，文部省就给“编撰会”修改定下了基调，指出了方向，只要对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就能使教科书审定合格。所以，“编撰会”能有恃无恐地公然与专家的审查意见想对抗。

对于文科省的态度，日本国内外舆论予以极大的重视。2001 年 2 月 22 日《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认为，文部科学省表示不论是什么样的教科书，只要没有与史实有关的错误就予以批准。如果这样，以“新的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为主导编写的 2002 年度版初中历史教科书将较充分地反映该团体核心成员的意图，攻击正义主张为“自虐史观”，肯定日本过去进行的殖民统治和战争。

3 月 3 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传召日本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野本佳夫，对日本教科书问题表明中方的关切和严正立场。中方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履行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联合宣言》中就历史问题所作的郑重表态，阻止有关的教科书出台。与此同时，韩国政府也提出了强烈抗议和修改要求。

为了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立场和感情。3 月 15 日，朱镕基总理在北京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明确指出，日本教科书问题并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它是日本和亚洲有关国家和亚洲人民的问题。这些教科书是由日本政府和日本的文科省来审定的，所以日本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能够以言论的自由来推卸这个责任。听说已经做了一些修改，但是，根据亚洲各国人民的反映，这种修改是不够的。我认为这并不是谁要去干涉日本的内政，而是关系到日本人民和亚洲，包括中国的人民能不能世代友好下去的问题，也是关系日本能否和平发展的问题。

面对国内外进步舆论的同声谴责，日本右翼势力大张旗鼓地

进行了反击。自民党“考虑日本前途和历史教育青年议会”一面公开指责中国、韩国要求日本修改右翼教科书是“明显的干涉内政”，一面向首相森喜郎提出“要求政府‘排除国内外政治的介入，堂堂正正进行教科书审定作业’”。^①著名的右翼政治家、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也站出来为“编撰会”辩护，声称教科书审定“涉及日本的主权”（教科书）正在编写作业时“还不是外国插嘴的时候”；外国“对教科书表示强烈担心是僭越”，^②为文科省鼓气。

4月3日上午，文部科学省组织的教科书检定审议会总会举行对教科书做最后的审定。当天下午，文科省正式宣布，由“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组织编写的初中历史教科书和中学社会教科书被审定“合格”，列入从2002年开始使用的中小学教科书的名单。至此，审定通过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增至8个版本。

5月16日，文科省宣布，今年4月审定为“合格”的8种日本初中历史教科书中又有数千处错误得到了订正。然而，这一“订正”并不真正涉及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内容。据日本媒体报道，各家出版社都删除了臭名昭著的所谓大约60万年前使用打制石器的原始人生活在日本列岛等捏造历史的记述。8家出版社共有4976个错漏之处得到修正。关于这次修订，文科省还强硬声称，订正的主要是“误记”和图版色彩等内容，对韩国、中国等要求修改的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内容不予进行订正。很显然，文科省不准备向后退却与妥协。

① 《产经新闻》2001年第3、7期，转引自王希亮论文：《评日本当代历史修正主义》，《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2期。

② 《产经新闻》2001年第3、10期，转引自王希亮论文：《评日本当代历史修正主义》，《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2期。

3. 各方强烈反应

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悍然通过右翼教科书，引起世界特别是整个亚洲的愤怒。中国政府作出了近年来少有的强烈反应。

4月3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陈健在东京就日本历史教科书审定结果举行记者招待会。他首先指出，日本右翼学者炮制的历史教科书已正式被日本文部科学省审核通过，中方对这一结果表示强烈不满。扶桑社发行的这本教科书目的是宣扬“皇国史观”否认和美化日本侵略他国的历史。该书用心险恶，基础反动，虽经不少修改，但其否认和美化历史的反动基调并未根本改变。中国驻日本使馆对这样一本教科书居然得以通过深感震惊和遗憾。

5月16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奉命约见日本驻华公使，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关于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备忘录，严正提出8项要求（全文见本书附录），再次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纠正右翼历史教科书的严重错误。

韩国的举动更为强硬。韩国政府暂时召回驻日本大使崔相龙，并宣布将采取包括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推迟“开放日本文化”的时间、无限期推迟韩日议员联盟年会、联络国际社会对日本施压等外交措施，以迫使日本政府改正态度。韩国各地不断爆发抗议示威、谴责集会、签名运动、抵制日货等活动，愤怒的市民走上街头，围在日本驻汉城的大使馆门前，焚烧日本的国旗，呼喊反日口号。

4月11日，韩国执政的大国家党议员金泳镇，在东京开始绝食抗议。16日，韩国议员金泳镇结束了长达6天的绝食抗议行动。6天之中，他一直静坐在东京日本国会大楼前，抗议日本政府通过歪曲历史的右翼历史教科书。据金泳镇自己对支持者说，在

冲绳等日本城市有更多的人也在进行绝食抗议行动。他说：“我们不能让这本歪曲历史的教科书被用来教育日本的年轻一代。对于韩国、日本乃至所有亚洲国家来说，这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金泳镇在宣布结束绝食行动时说：“我永远不会停止与日本歪曲历史、复活军国主义的图谋作斗争。尽管我暂停此次绝食抗议，我们的人民还会继续抗议。”

5月8日，韩国外交通商部长韩升洙召见日本大使寺田辉介，代表韩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关联内容修正要求资料》共35条意见，其中25项是针对右翼教科书的。主要有：宣传朝鲜半岛威胁论，把朝鲜半岛说成是“从大陆伸向日本的一个拳头”；把强行吞并朝鲜半岛描述为“帮助朝鲜实现现代化”；隐瞒日本军警在关东大地震中屠杀朝鲜人的事实；故意不提“从军慰安妇”问题，美化日本历史，贬低韩国历史，回避发动侵略战争和进行殖民统治的责任等。并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有诚意的修改措施”并且“采取根本性的对策，以防止歪曲历史的问题再次发生”。

围绕着右翼教科书，日本进步、正直人士的反对声浪也是巨澜迭起。2月21日，日本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朝日新闻》在头版报道了“编撰会”的历史教科书的审定情况。该报还在第三版报道了中、韩、朝3国的反应，指出鉴于新编历史教科书整体基调不好，加上日本前众议院预算委员长野吕田美化侵略战争的发言又火上浇油，围绕教科书问题，中、韩、朝等国与日本之间将难以避免新一轮历史问题论战。

第二天，即2月22日，日本右翼喉舌《产经新闻》发表一篇署名文章，题为《朝日新闻的教科书报道意味着什么》，点名指责《朝日新闻》是故意诱导国外压力。文章称，日本在以往的教科书问题上总是最后退却，在教科书中加入丑化和矮化日本的表述，摆脱不

了“一旦遭到邻国批判日本政府就政治介入”的恶性循环 认为“教科书不应成为外交谈判的工具”煽动和鼓励日本政治家和政府官员这一次要顶住 不为外来批判所左右。

显然是已经考虑到右翼的这种反对观点,《朝日新闻》于 22 日也发表了一篇社论 题为《密切关注教科书审定动向》 旗帜鲜明地对日本政府教科书审定结果提出批评。社论引用新编教科书大量美化日本侵略史的表述后指出,新编历史教科书是在右翼团体主导下完成的 观点失衡 不仅肯定日本过去的殖民和侵略历史 而且丑化和攻击正确的历史认识是“自虐史观”完全无视曾遭受日本侵略的受害者的感情及日本国民在战争中的苦难。向肩负未来的孩子们传授这种历史观是否有益 令人怀疑。社论还强调 目前陷于政治、经济双重低迷、丧失自信心的日本社会 存在着容易被美化过去的历史观诱惑的空气。主张在艰难的时局下更应反省过去走过的道路。那种一味主张自己过去是正确的历史观,无论在日本国内还是在与有关国家的关系上都只能产生无谓的摩擦,并给学校教育带来混乱。社论还要求教科书的审定过程应努力做到透明和公开。

随后几天 两家报纸都接连发表社论 进行激烈的论战。2 月 26 日和 27 日,《产经新闻》还大规模刊登日本大分县中小学使用所谓的“民族自虐性”教材的报道 说学生在读后感中写道“没想到日本人做过这样的坏事”、“日本军人残酷”表明孩子们受到“强烈冲击”,“无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心”云云。

《朝日新闻》和《产经新闻》两家日本媒体 前者主张按历史本来面目编写教科书 后者借口反对“民族自虐”极力要求为“大日本帝国”歌功颂德。这两家报纸的论战是日本国内进步史观同“皇国史观”的又一次较量。反映了日本国内两种明显对立的社会思潮,这场论战对日本政府和社会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从这场论战

中可以看出 由于战后日本那段侵略历史没有得到根本清算 日本国内为‘大日本帝国’招魂的右翼势力近年来在一定条件下已有所抬头。与此同时 尊重历史事实、坚持和平民主道路的日本人士也坚持自己的道义立场 坚持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的态度 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在这场论战中,《产经新闻》针对 2 月 23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教科书问题的表态,说什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要求日本政府阻止‘编撰会’教科书的使用是干涉日本内政 中方应收回发言 这样才符合日中友好精神。这完全是强词夺理!事实上,日本历史上对亚洲国家的侵略战争给中国等国家造成惨重灾难 日本对这一历史的认识关乎受害国的民族情感 关乎亚洲各国对日本的信任程度。日本用什么样的历史观教育后代,关系到日本今后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还是可能重蹈军国主义道路的问题。所以,这决不是个简单的日本内政问题。

日本进步团体和正直人士对右翼教科书的出笼也表示出担忧。3 月 17 日,以日本前首相三木武夫夫人三木睦子、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坂本义和等人为代表的一批著名社会活动家与学者,在日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了他们对歪曲历史、美化战争的历史教科书出笼感到忧虑的声明,声明要求日本政府不要通过这些篡改历史的教科书。声明指出 现在正在审定中的 2002 年中学用历史教科书从原有的 7 家出版社增加到 8 家 但从原有的 7 家出版社送审的检定本来看 问题已经相当不少 其中有 4 家删除了有关‘慰安妇’的记述;5 家出版社中有 4 家去掉了‘三光政策’所有送审的教科书中全部抹去了有关‘七三一细菌部队’的记述。‘侵略’用语也改成了‘进入’等其他用语。更引人关注的是由扶桑社送审的教科书,里面竟有肯定殖民地统治和侵略的内容。对于这样的教科书是不能予以承认

的。声明中还指出 如果隐瞒过去的历史事实 片面地按照美化本国的历史观教育日本青年一代，那么日本在亚洲和国际社会中是得不到信赖的。为此，日本的教科书必须直率地承认因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而造成的伤害。声明还对日本所谓的言论自由和教科书审查制度提出了批评。

4月3日 日本社会民主党在众议院举行‘反对篡改历史的历史教科书紧急集会’批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主编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美化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呼吁日本政府和社会制止这种歪曲历史的行为。社民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在集会上说，虽然日本宪法保障言论自由 但历史教科书却不同 它要为孩子们的未来承担责任。“编撰会”主编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把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正当化，尽管在审查中作了个别修改，但其基本历史观并未改变，文科省若让其审查合格，即表明这种历史观被日本政府接受。“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组织 21世纪”秘书长依义文在集会上发表演讲 揭露了日本右翼势力和‘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一步步篡改历史的行径。他警告说 违反宪法、肯定侵略战争的‘危险的教科书’已经出现 其目的是要让日本重新成为‘可以战争’、“能够战争”的国家。集会得到了多个民间组织和宗教团体的支持。会议发表呼吁书说：“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主编的历史教科书歪曲历史、赞美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 如果日本政府让这样的教科书审查合格 并用于孩子们的历史教育，无疑意味着重启战前错误的历史教育之路。如果不制止这种危险的动向，日本将在世界和亚洲深陷孤立。

但是 随着自民党强硬派小泉纯一郎出任日本首相 教科书问题变得更加无法转圜。24日 日本前厚生相小泉纯一郎当选自民党总裁，从而在事实上成为日本新一任首相。当小泉即将继任首相的消息传到最近因‘历史教科书事件’而与日本交恶的韩国 韩国各界普遍对右翼意识浓重的小泉纯一郎当选表示忧虑。当然，

如果回顾一下小泉纯一郎在竞选自民党总裁过程中的言行，就不难理解韩国人对这位日本新首相的不安了。12日小泉纯一郎在与其主要竞争对手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时就已声称“编撰会”的历史教科书“没问题”。稍后小泉又公开表示如果他当选首相，他就将以首相身份正式参拜象征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面对这样一位频频放出右翼言论的日本新首相，韩国各政党忧心忡忡。24日，韩国媒体纷纷报道了小泉纯一郎当选自民党总裁的消息，并同时刊登了小泉在竞选中发表的右翼言论。韩国全国性报纸《韩国日报》在头版的报道中写道：“小泉是一个在外交政策上持强硬态度的保守派。现在亚洲国家都在关注，日本是否会在小泉的领导下向右翼倾斜。韩国私立智囊机构的国际问题专家李淑贞在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小泉纯一郎当选意味着“历史教科书事件”的解决必将荆棘密布。历史证明李淑贞的判断是正确的。“编撰会”历史教科书最终果然被顺利通过了。

那么右翼历史教科书是怎样通过所谓的正当途径出笼的呢？

二、2002 年教科书的编纂与出版过程

1. 日本教科书的审定制度

日本现行教科书审定制度是从 1948 年开始实施的。当时的日本政府制定了《学校教育法》。该法规定 凡教科书必须经文部省审定后方可在学校使用。日本的教科书书稿通常由出版社组织编写 文部省过去每隔 3 年、现在每隔 4 年审定一次。有意出版发行者 须按照国家颁布的《教学用书审定标准》和各科《学习指导要纲》 聘请有关学科的学者和教师编写 定稿后将教科书书稿提交文部省审定。这就是日本的教科书审定制度。

具体来说 按照日本政府的规定 教科书从开始编写到在学校实际使用须经以下程序。

首先，由准备出版教科书的出版社组织编写班子。通常编写班子由 10 到 20 人组成，一般为各学科的专家 其中包含学术上有造诣的大学教授和富有教学实践经验的中、小学教师，一般多以大学教师为中心。初稿完成后 出版社召开“检讨会”对初稿提出修改意见 并进行修改。

其次 各出版社将编好的书稿 日语中称其为“白表纸本”以示没有装帧封面和公开出版 递交文部省申请审定。通常 文部省按小学、中学、高中和大学等类别和不同科目 设有专门负责审定教科书的调查员和审议会。调查员将教科书书稿的审定意见形成书面文字，然后将结果上报教科书审议会审议。审议会通过商讨，

最后以多数意见作为审定结果。审定结果分合格、需修改和不合格三种。初审如果是定为“需修改”的教科书书稿，出版社在 40 天内修改后可再次提交审议会审议。如果样书不按要求修改，将被终审定为不合格。初审如果是定位“不合格”，那么需要全面改动后再提出审定（即再递交“白表纸本”）。文部大臣在听取文部省咨询机构“教科用图书审定调查审议会”的意见后，最后决定合格与否。

第三 经文部省审定合格的各种教科书，在各府县教育委员会举行的新书展览会上展出，供有关人员前去选择。公立小学、初中教科书的选择权归其所属都道府县的教育委员会所有，但它必须根据由教育委员长、学校校长、教师代表等组成的“选择教科书委员会”的协议结果，决定该地区使用的教科书。反映教育第一线教师意见的“学校票”在选择教科书时发挥着重要作用。公立高中的教科书选择权虽在教育委员会，但每所学校可以提供选择适合本校的教科书的意见。国立、私立学校的教科书选择权则归学校所有。

第四 各地区及学校选定其所用的教科书后，由文部省将各学科所需教科书册数通知各出版社，并根据各出版社的实际成本加合理利润来确定教科书的价格。各出版社在每年 4 月新学年开始前，将印刷好的教科书送到学校。日本政府对小学和初中的教科书实行免费供给制度，高中教科书由文部省审定，并规定价格上限，由学生自费购买。

上述从教科书的组建写作班子到审查、选择、印刷过程的周期约 4 年。在日本，出版教科书较为出名的有东京书籍、日本文教、大日本图书、光村图书、教育出版、学校图书、大阪书籍、帝国书院、启林馆、开隆堂等。^①

日高六郎编：《日本と中国——若者たちの历史认识》梨の木舎 1995年版 第 96—115 页。

在这一过程中，教科书样书的审定权与选择权是两个关键。审定权将决定样稿能否作为教科书出版；选择权决定该教科书能否被大量使用。其中掌握在日本政府手中的审定权可以从根本上筛选掉‘不适当’的教科书，因此是关键中的关键。

自 1982 年发生日本文部省通过篡改历史教科书来美化侵略战争的事件后，在亚洲国家和日本国内的强大压力下，当时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官泽喜一发表谈话，承认了错误，许诺对教科书进行修改，并且把要照顾同邻近亚洲国家关系这一精神作为日本政府审定教科书的基准之一，这就是所谓的‘邻近国家条款’。但是文部省强调，它审定教科书是看内容是否与历史事实有出入，至于编撰者的思想，因为日本是“自由国家”，因此“无法限制”。事实上，日本政府是在推诿责任，从这次教科书的编撰到审定，就可以明显地看到文科省的权力、倾向与选择。右翼教科书得以出版，正是文科省企图美化侵略战争这一思想倾向主导下的直接结果。

2. 文科省的暗示

这次编选 2002 年用教科书是从 1998 年开始的。编写、审定教科书的基准是文部省制定的《学习指导要领》。文部省在 1998 年版《初中学习指导要领》提出的关于历史教学的目标：“要提高学生们对历史事实和现象的关心，了解在世界历史背景下我国历史的主要潮流和每个时代的特色”，加深对我国历史的热爱，培养国民的觉悟”。这部《要领》对日本历史上每一个阶段的教学都提出了详尽的指导意见，但在关于二战前后的历史教育部分却仅写有以下几句话：“要使学生看到从昭和年代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我国的政治、外交动向，我国同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关系以及欧美国家的动向，了解经济混乱和社会问题的发生，从军部抬头到战

争的经过 同时要看到当时日本国民的生活。另外 要使学生了解世界大战给全人类带来的灾难”。^① 该《要领》只字不提要使学生了解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性质、责任和日本的侵略罪行等 这是一个重要的暗示。

1998 年 6 月 8 日，文部大臣町村信孝在国会就教科书审定一事的答辩中说到：“历史教科书的偏向 正在研究在审定前能否纠正 通过选择能否改善。”町村这里所说的“历史教科书的偏向”是“缺少整体的平衡”；特别是否定明治以后的日本历史的地方太多 连篇累牍”；在审定教科书的审议会上 希望讨论一下能不能让各编辑人员在今后审定教科书时，或在此之前的执笔阶段在这方面注意保持一下平衡。另外在通过的阶段是否应该有稍微进行改善的余地”。而他宣称的要“通过选择”来进行“改善”就是要抑制正确教科书而鼓励保守的、歪曲历史的教科书的出笼。

很显然，《要领》和町村讲话 向正在编写 2002 年版教科书的出版社发出了信号 即必需改变历史教科书中的“偏向”问题。

1999 年 1 月，文部省非正式地要求初中社会教科书的出版者 在申请审定之前把内容搞得更平衡一些 并重新评价作者队伍的构成。在编写教科书期间 政府有关官员甚至亲自出面 施加压力 让日本文教等 7 家出版社“自我限制”；自主订正“有关侵略和战争罪行的记述。于是在政府的暗示和“明示”下 各个出版社纷纷右转，以求顺利通过教科书送审本。8 月 东京书籍、教育出版和帝国书院 3 家出版社提出了自主订正的申请 在“从军慰安妇”的表述中 删除了“从军”、“强制”等词句。12 月 文部省批准了这个订正。

今野日出晴：《中学校历史教科书との间》日本《战争责任研究》（2000 年秋季号 总第 29 号）。

为了确保教科书的“改恶”文部省还更换反对通过“编撰会”教科书的“教科书审定调查审议会”委员。同时又保留立场右倾的人员。本来在 1998 年 4 月，文部省任命了一个与鼓吹修改历史教科书组织关系颇深的人担任教科书调查官。此人一贯将中国称为“支那”是肯定侵略战争的十足的右翼分子。在日本进步组织的抗议下文部省不得不于 1999 年 11 月解除了此人的职务但还是让他担任对审定教科书和对一线教育有很强影响力的督学官继续留在文部省。

3. 日本政府的责任

到 2001 年春，经过一年的审查，8 家出版社提出的书稿全部被文部科学省放行。这批书稿中不少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问题。原来的教育出版、日本书籍、大阪书籍、东京书籍、日本文教、清水书院和帝国书院等 7 家出版社的教科书在日本侵略及其战争罪行的表述上大幅度倒退。而“编撰会”编著、扶桑社发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和《中学社会教科书》则篡改日本历史、掩盖战争罪行、美化侵略战争，存在着许多涉及到重大政治原则的问题。

“编撰会”的教科书被文科省轻松通过连日本国内很多舆论和个人都感到惊讶。他们指出在现行的教科书审定制度中文部科学省作为日本政府的主管部门在进行最后审定时理应按照“邻国条款”要求“编撰会”彻底修改书稿中不符合史实的记述。但是日本文科省不顾国内舆论的谴责和亚洲各国的抗议采取了含糊以至纵容的态度。

事实说明，日本政府特别是文科省在此次修改和审定历史教科书问题上起到了主导作用，并负有重大责任。这种作用与责任主要表现为：

第一，文部科学大臣具有对教科书的审定权，什么样倾向的教科书最终能够获得通过并在课堂上使用，实际上是由文科省决定的。特别是在新的教科书编撰之前，由文部省主持撰定的《学习指导要领》，代表了日本政府官方的历史观，主导了民间教科书编撰的思想倾向，因此，此次右翼教科书的顺利出版，日本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二，为了使教科书“纠偏”，不少政府部门都行动起来。1999年12月，“首相官邸人士”给中学社会科的教科书出版社总经理打电话，要求慎重处理对“从军慰安妇”的表述。某出版社的总经理在和工会的谈判中确认了这件事。在这种甚至动员了“首相官邸人士”的政治压力下，教科书出版社要求作者删除“从军慰安妇”的内容。第三，为使教科书审定合格和被采用，“编撰会”以政府和执政党的首脑为对象展开全国性的政治活动。大部分的政府首脑和官员接纳了这样的活动。因此，文科省和现任文部科学大臣的政治家们顺应右翼势力的要求，对写有“从军慰安妇”的记述和“侵略”的用语的历史教科书施加种种政治压力，表面上提出“自主规制”，其实是强制行动，逼迫写作者和出版者趋向保守。在这一点上，日本政府整体上的责任更加重大。我们不能允许日本政府对这样的责任佯装不知。第四，“编撰会”教科书中存在不少违反日本宪法，违反以往日本政府公开声明的国际义务、国际公约的内容，文科省作为日本政府的最高文化教育管理机构通过这样的教科书，已表明日本政府在战争认识等问题上出现大倒退，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正如日本学者上杉聪所比喻的，如果将“编撰会”的教科书比作车辆的话，他们一开始想制造一辆装甲车，这与人类社会和平时期用的汽车毕竟有很大的区别。为了伪装，只能改换一些汽车零件，并宣称这是一辆汽车。实际上是一辆制作有缺陷的车子，它只是作了局面的处理。但文科省竟认定它为“安全车”，还帮着“编撰